

上帝要顾念你

A scenic landscape at sunset. A gravel path leads through rolling green hills towards a bright sun on the horizon. The sun is low, creating a warm, golden glow and long shadows. The path is flanked by lush green grass and wildflowers. The sky is a mix of orange, yellow, and blue.

瓦莱丽·克鲁伊斯

上帝要顾念你

行走个人充满考验，悲伤和

安慰的人生路

谨将本见证献给我们的儿子但以理，他帮助我找到了上帝，是他需要的也是我们都需要的。

瓦莱丽·克鲁伊斯

(Val Cruwys)

主必快来媒体



2020年5月

目录

我的早年生活与婚姻.....	1
首次遇到复临信徒	2
皈依加入教会	4
大儿子发生车祸.....	6
枪击事件	8
和彼得森妈妈住在一起.....	10
手术.....	12
康复.....	15
发现.....	17
三儿子丹尼尔.....	19
上帝彰显他的旨意	20

我的早年生活与婚姻

我的父亲生于 1898 年，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隶属于英国教会。我的母亲出生于 1916 年，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来自爱尔兰，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结婚时还带着我们同父异母的姐姐琼，她的母亲在 6 年前去世了。当时琼的双胞胎妹妹简和妈妈死于难产，只有她活了下来。我父母在悉尼的阿恩克利夫租了一套房子，多年后一直到我结婚时，他们一直还租着那房子。

我的父母亲共生了 6 个孩子，其中两个未满 4 岁就夭折了。我是他们婚后养育孩子中最大的。虽然我们经济上很穷困，但我不记得父母何时吵架、打架，因此我们拥有快乐、安稳的童年。因为我们成长于天主教背景下，当地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来看我们（爸爸在家的时候从来不来）。因为教会不认可母亲的婚姻，神父修女告诉妈妈我们都要下到可怕的地狱中，这件事让她倍感不安。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经常把她说的泪流满面。他们说我们一家人会在地狱里痛苦地燃烧、尖叫，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错。

我的母亲身体不太好，患有肾病（那时还没有透析机）。她于 1956 年去世，年仅 40 岁，也就是在我们同父异母的姐姐琼结婚一年后。她的葬礼结束后，我和妹妹回到修道院学校。但是父亲让两个年幼的弟弟在公立学校读书。每天早些时候我送他们去上课，然后下午回家的路上接他们。

有一天我去接他们，他们不在学校。有人告诉我，午餐时有两名男子开着一辆黑色汽车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到 4 哩外郊区的科加拉天主教马理斯特兄弟学校。我抓起弟弟的东西就匆匆跑回家。半小时后，爸爸回到了家，当我告诉他两个男孩的事时，他很生气，去了警察局。我们的父亲是盲人（遗传性黄斑营养不良），所以警察开车送他到马理斯特兄弟学校，他们发现学校空无一人，因为天已黑了。爸爸呼唤孩子们，听到爸爸熟悉的声音时，两个不知所措、心烦意乱的小男孩从操场上走了出来。孩子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即使知道，也没有钱回家，人家就把他们丢在这。警察晚上 7 点左右把他们带回家，我简直不敢相信教会居然敢做这样的事，特别是爸爸 6 周前还在为妈妈的去世而难过。

过了几个星期，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有人敲门。我打开门，看见6个大人说他们来自福利部门，来接住在这里的4个孩子，要把他们带到寄养家庭。他们刚要进屋，我就关上门，从后门跑出去告诉爸爸。爸爸去迎接这些可怕的人，我们则躲在不同的地方。我听到他们嘲笑父亲，他们说：“你失明了，无法照顾孩子。”但父亲捍卫他为父亲的权利，执意要留下我们。他们最终离开了，并威胁要诉诸法庭。

几个星期后，父亲被告上法庭。我们呆在家里，锁上房门。后来，爸爸回家了，告诉我们他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找一个女人来照顾我们，否则我们要到天主教家庭去。不得已，我们已婚的姐姐带着她3个月大的儿子回了家，扮演起母亲的角色。她待了差不多一年，直到我长大到可以离开学校照顾家人（14岁）。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不喜欢她的安排，所以他住在别处，我姐姐的婚姻破裂了，几年后他们离婚了。此后，天主教徒再也没有打扰过我们。

1963年，我遇到了未婚夫内维尔，我们在1964年结婚。婚后我们去了新南威尔士州新英格兰地区的坦特登，住在一块1680英亩大的地产上，那是我丈夫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他父亲早在1963年就去世了。因为我丈夫的父亲在加里波利的轻骑兵旅服役，此处房产是作为士兵的财产分给他的。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生了我们的头两个儿子，史蒂文生于1967年，沃伦生于1969年。在沃伦出生后，当我看着“美丽的贝内特彗星”，还有那漆黑的夜晚中无数的星星，我第一次想到了上帝，以及这些美妙的夜景是如何形成的。

首次遇到复临信徒

1969年年底，我们来到另一处地产做了两年的牧场工。这个地方叫做灌木溪，某人在他遗嘱中将之捐赠给了救世军。离此大约500米处还有一所房子，这里的经理和他的妻子曾警告过我，说住那房子里的人很奇怪，要我小心他们。因着这个建议，我没有去找他们。直到……

有一天，我们从镇上回家路上遇到暴风雨，把我们困在了小溪的对岸。我们等了4个小时，要等到水退得够远，才能穿过小溪回到位于灌木溪的家，这两处相隔500米。因为天很冷，生火用的木头也湿透了，所以我们晚餐吃不上热饭。不一会儿，有人来敲门，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里端

着一个大炖锅，里面盛着热蔬菜。他说他妈妈看到我们被困在小溪的另一边，因此决定为我们多煮一些蔬菜，只是里面没放肉。他解释说他也在这儿工作，就住在那栋房子里，他指的就是以前有人警告过我们的那房子。我谢过他，他就走了。我们是多么感激他送的这顿美餐啊！

第二天，我去还平底锅，男孩的母亲出来迎接我。我们相互做了介绍，她叫伊娃·威廉姆斯。她告诉我，几年前她心脏病发作，那时她就祈祷，如果上帝让她度过难关，她愿将余生献给上帝。她问我是否可以给孩子读书，我说可以，她把阿瑟·麦克斯韦的《儿童圣经故事》的第一册递给我。我拿起这本书，一直读到利未记 11 章，就是肉类分为洁净和不洁净。我认为这书的内容是一堆垃圾，难怪人们认为他们古怪。我把书还给了她，说我不会再做这种事，后来就再也不去她家了。不久之后，人们把灌木溪的房子被卖掉了，我们都搬走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回到了我们位于塔宾哈的房产。到了 1973 年底我们又把它卖掉，买了一辆 21 英尺长的大篷车。那个叫伊娃·威廉姆斯的女人和她的孩子都搬到了阿米代尔。在我们住在大篷车的那段时间里，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来回旅行，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我们的三子丹尼尔出生于 1974 年，女儿凯瑟琳出生于 1975 年。我们现在有了四个可爱的孩子。

1974 年，我们的第三个儿子出生后，我又回到大篷车，内维尔问我，为什么人们在周日去教堂，而圣经说他们应该在周六去教堂？我不知道，所以我让他去找周日去教堂敬拜的人，问问他们。1975 年，女儿出生几个月后，我们在昆士兰州格莱斯顿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我丈夫在昆士兰氧化铝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二年，也就是 1976 年 10 月，我在格莱斯顿认识了我的救主。

现在我们有了固定的住所，远离了那些大篷车旅店偷东西孩子的影响，我想我应该教给孩子们十条诫命，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只记得两条！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当我想怎么做解决这个问题时，前门传来了敲门声。她是我们的邻居，就住在楼上，是四户人家中的一个。她下楼来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又邀请我参加几天后在特百惠举行的派对。她说只要我愿意参加，就能认识附近的人。我去了，派对结束后，女主人说她很快要离开，去帮忙史密斯神父打扫宅邸。我立刻问她是否知道十条诫命，但她和我一样糟

糕，只记得两条。她说那天下午要向史密斯神父要一份。

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每个星期都问她记不记得，但她很健忘，我只有放弃了。过了一段时间，继我们之后又有一家人搬进来。我注意到他家的孩子穿着天主教学校的校服。于是，我向那位女士介绍自己，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是否知道十条诫命。但是她也不知道！不过她答应让她的女儿们帮我写下来。我等了又等，但事情没有进展，因此我放弃了，认为这一切都是徒劳。

不久之后，我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份 5 天戒烟计划的传单。我决定参加这一次学习改掉坏习惯。我参加了那次讲座并戒了烟。之后，我拒绝和丈夫接吻，告诉他我不想和一个烟灰缸接吻！所以一周后他也戒烟了！

皈依加入教会

大约一个月以后，又有人在我家信箱里放了一张传单。这次讲座的内容是和关历史学和考古学相关的。我想我一定要去，这内容听起来很有趣；但是时间在内威尔下午班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必须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去。我把 6 个月大的女儿放在篮子里，拉着一个快 2 岁的男孩，6 岁、7 岁的两个孩子则抱着枕头和毯子，我们每天晚上一起去听雷·肯特的讲道。第三天晚上，他讲述了教皇的历史，教皇如何将安息日改到星期天，更改了十诫，以及可怕的十字军东征等等。我震惊地坐在那里。教皇竟敢把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我感到愤怒；如果教皇在场，我一定会掐死他。

大约半夜时候，内威尔下班回到家，发现我躺在床上，周围摆满百科全书，正在查看我那天晚上学到了什么。我终于可以回答内威尔很久以前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人们在星期天去教堂？”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和天主教会任何瓜葛了。接下来的安息日，我去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我要为天上的上帝挺身而出，如果我不做正确的事，我怎么能教我的孩子做正确的事呢？我想。

凡是参加整个 10 个晚上课程的人将得到一本美丽的家庭壁炉版雅各王钦定版圣经。我那本圣经是格雷姆·奥尔森牧师在周三的雷·肯特课程结束后亲自送来的。他告诉我，他们周三晚上在教堂有圣经学习，大家非常欢迎我来参加。我谢过他，关上门，坐下来，把《圣经》放在腿上。因

为内心充满了敬畏，所以当我的手抚摸封面时不停地颤抖。我以前从未接触过《圣经》，心里既害怕又好奇，因为天主教徒曾教导我们，迷失的新教徒拿着《圣经》，天主教信徒永远也不需要，否则也会迷失。我想到教皇是如何将自己置于上帝之上又更改了诫命，想起了神父和修女们的行为，想起了天主教会多年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他们的行为肯定不是基督徒，因此我了解反对他们之人是的教导。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圣经！

我从《创世纪》的开头读起，第二章就讲到了第七日。难道上帝会无缘无故的设立第七日吗？我想。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带着我的《炉边圣经》来到了学习班。大家都面带微笑，我也一样。但是我没有想到，大多数人微笑是对我带来的那本大部头《圣经》感到好笑。

几天后，奥尔森牧师笑着送给我一本便于携带学习的圣经。他问我是否愿意在家学习圣经，我说这对我来说更方便，因为我有四个孩子，内维尔还要上轮班。第三天学习是有关死后状态的，这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在之前我一直相信我的母亲一直在看着我。学习结束后，我要求施洗，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基督徒，但牧师说要等一等，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先做。所以接下来的研究是关于去除珠宝首饰的，之后的内容是属上帝女人应该穿戴何种衣服、使用什么样的化妆品。所以，请放弃妆容、珠宝和轻浮服装吧！三周后，我接受了洗礼，当时 34 岁。丈夫允许我将两个最小的孩子带到主前，但两个大一点的男孩要像父亲一样参与板球和其他运动，这件事导致了家庭的紧张不和。

我找到了伊娃·威廉姆斯，就是多年前住我们附近的灌木溪，就是在那个暴风雨之夜为我们煮蔬菜的那位姐妹。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为从前认为他们怪异、抱怨儿童圣经故事的事情道歉。我告诉她我们分手之后发生的事情，而且我现在是一个新受洗的复临信徒等等。两周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她说她看了信封上写的寄件人，很惊讶是我寄来的。她打开信读了起来，说，她流下了很多幸福的泪水，把信读了好几遍。在接下来的安息日，她来到新南威尔士州阿米代尔教堂，把这封信读给大家听！因为几年后她去世了，所以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在格莱斯顿教堂，我参加了营养和烹饪培训，也成了多加事工的领导人(妇女事工部：缝制施舍贫民衣服的妇女会)，并做了福利工作。除此之外，我还带领摇篮班的崇拜，偶尔也会在安息日上成人课。那时处在德斯

福德和 Glacier view 的时代，教友们讨论教会名称与标志的问题，想要去掉 3 位天使的标志，代之以 3 个波浪。我担心事情会发生变化，我很关心教会将走向何方？

我的工作太多了，就放弃了圣经学习，灵性也因之受到了影响。我最小的两个孩子还要接受在家教育，这件事使得新牧师很不高兴，因为他认为这会“给我们的教会带来坏名声。”他说。我要求教会给我减掉一些工作，但没有人愿意承担任何一项任务，这让我很失望。最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但突然间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大儿子发生车祸

一个星期三晚上，我们的学习和祈祷小组刚结束，我正在教堂外和一位弟兄聊天，突然感觉心烦意乱，乌云笼罩着我。我听得到那位弟兄说话，却看不见他。于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说我必须回家。那时，我只能看到地面，却看不见前面的路。而后我朝汽车走去，在我发动引擎那一刻，云层消散了，我可以开车回家了。回到家后，我就发现一个月后将满 17 岁的史蒂文和 15 岁的沃伦还没有从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回家，那里的课程与我们的祈祷会同时结束。这时，乌云散去慢慢地消失，我想：“孩子们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来？”

我泡了一杯热饮，等待的时候，拿出了我的《圣经》。晚上 10 点刚过，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发现是巴里，他是史蒂文在昆士兰皇家汽车俱乐部的同事。他要求和内威尔谈一谈，所以我就去把他叫醒，我们俩坐下来听巴里说什么。他说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警察要过几个小时才来通知我们，我们的两个孩子在 9 点发生了一场大事故。9 点钟？那正是乌云笼罩着我的时候！我们感谢巴里给我们送信，然后去了医院，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独自睡在床上。

当时是凌晨一点多，所以内威尔需要留在医院，我要回去看看其他孩子。我给几条街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事情。我问她可否带孩子们去她家过夜，因为我得回医院。“是的，来吧。”她说。所以我把孩子们带到她那里，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然后我就回了医院。大约早上 5 点，医生要求我们回家，睡上一觉。睡觉前，我祈求上帝赐我一个证据，沃伦可否活下来并送到布里斯班。

到了早上 8 点，我们回到医院，首先去看望沃伦，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人提及布里斯班这几个字。我感到泄气，告诉上帝我愿意接受他在我们儿子身上所有的旨意。于是我们离开沃伦，去病房看望史蒂文。我们沿着走廊走上电梯，电话铃响了，就在我们拐进电梯那一刻，我听到有人在叫我们的名字。电话是医生打来的，示意我们回去。我以为沃伦清醒了。医生问我们愿不愿意带沃伦去布里斯班，因为在罗克汉普顿有一架未载人的医疗飞机要去布里斯班接一名返程的乘客。内威尔还未来得及考虑，我就答应了。这问题是对我祈祷的回应，意味着我们的儿子能活下来。

我们去楼上找史蒂文，把沃伦的事情告诉他，他不信。说：“不，他已经死了，我知道他死了，不要对我撒谎。”我们根本安慰不了他。我们同着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带着一台生命维持机去机场为沃伦送行。接着，我们买了第二天去布里斯班的票。我们又安排凯西和丹尼尔住在另一个在家教育的家庭，并通知了隔壁的邻居，让他们在我们不在家时替我们照看房子，并代我们收邮件等等。期间，布里斯班医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沃伦的脑部血压高，如果能降压，他就有一线希望活下来。又询问我们可以给他做手术吗？“是的，”我说，“可以的。”然后我就冲出去告诉内威尔沃伦能活下来！”在接过那个电话之后，我才意识到沃伦被送过来是做器官捐赠的，但在我看来，这是对我的祈祷的回应。

我们到了布里斯班，看到沃伦处于昏迷状态(持续了 6 周)，一直靠生命维持设备续命。在这期间，医生逐步的给他撤去机器。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身体左侧瘫痪。而且视神经严重受损，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不久之后我们回到家，让内维尔继续工作。一两天后，我带着丹尼尔、凯西开车回到布里斯班。我每天在医院里给他们进行家庭教育，也帮助其他病人做游戏，帮助他们活跃大脑，这让护士们很感激，因为他们每天真的没有时间做这些……我们住在卡兰格的沃森公园。史蒂文从格莱斯顿医院出院大约一个月后，内维尔带着他来访，让他亲眼看看沃伦还活着。史蒂文待在家里很伤心，唯一能安慰他的方法就是带他过来，亲眼看看弟弟。当他看到沃伦时崩溃了，我们不得不多次拥抱他。后来沃伦慢慢地苏醒了，却认不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时，面临这样的打击，我丈夫崩溃了。

而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上帝不让我想这个问题……

那场车祸发生于 1984 年 8 月，沃伦在次年 3 月出院。然而他的眼睛

还有好几年的康复期，需要做多次手术。他的注意力每次只能集中 2 分钟左右。而且不管他想到什么，会把同一个问题重复了 100 遍，以致家人受不了，都走了，只剩下我和他住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慢慢地有了进步，能够进行简短的交谈，逐渐好起来。因此，我们常在格莱斯顿和布里斯班之间奔走。到了 1990 年，当时沃伦恢复得手中只剩下一根拐杖了，还设法拿到了驾照。“你是怎么通过视力测试的？”我问道，因为他是复视。“这很容易，”他说。“我盖上一只眼睛读图表，然后再盖上另一只眼睛，再看图。”直到今天，他仍然是眯起一只眼用一只眼睛开车，累了就换一只眼睛。

枪击事件

那场车祸已经过去 6 年了，沃伦和他的朋友迪安决定去北方做采摘工，沃伦驾驶拖拉机，迪安做采摘工。他们要去凯恩斯，那里的芒果成熟的比南方早。沃伦那年 21 岁，在经历了这许多事情后，终于可以独立生活后，他很是兴奋。于是，他们开始了新的冒险。

那天是 1991 年 10 月 31 日。我首先开车送内威尔上班，中途把凯西放在朋友那里，最后在格莱斯顿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吃早餐。在等待购物中心开门的时候我看了一会书。当我拿着刚买的食物走过收银台时，看见内威尔在外面等我。我想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们一出购物中心的门，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告诉我警察已经去卡利欧佩找过我们了，但我们不在。最后，警察来到他的工厂，找到他，告诉他坏消息。艾尔利海滩发生了枪击事件；沃伦和迪恩被打得很惨。迪恩死了，但警方不知道沃伦的情况。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内威尔接着说，他是借汽车过来的。他已经向麦凯公司请了几天假，所以他必须回去为工人们安排工作日程。他走了，我把买的东西装上车，去救护站支付沃伦的救护车费用，否则我们将会支付一笔巨额账单。我首先准备了车费、住宿费等物，又去给小牛买了饲料和几捆干草。接着就去接内维尔，当我们去接凯西时，她哭着说：“为什么沃伦会遇到这些事？”最后我们去昆士兰皇家汽车俱乐部的拆车场接了丹尼尔，他在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和史蒂文住在一起，史蒂文负责皇家汽车俱乐部拆车场服务。后来我给史蒂文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并告诉

他我们第二天早上要去麦凯。我告诉他丹尼尔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已经把凯西留在家里喂小牛等，也会给她打电话，询问她是否平安。我们要离开3天。

我们到医院时发现沃伦已经用过麻醉药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去拜访麦凯警察局的保罗·威尔逊，是他给我们留了一张纸条。他告诉我们，枪手是乘长途汽车从凯恩斯来的，为要报复几年前把他关进监狱的一名警察。但是那个警察几个月前就被调走了，而警方不愿透露他的下落。枪手就离开了，回到他住的地方，吸过毒，把闹钟定在了他以为的下午4点，但实际上是凌晨4点。他打算在下午4点去射杀他所看到的任何男人、女人和孩子。

凌晨4点，他起来，穿上军装、军靴，系上多余的弹药和手榴弹，带上已组装好的由上海克虏伯不锈钢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式突击步枪。因为周围没人，他就朝商店橱窗和停在主路上的几辆车开了枪。然后他遇到了沃伦和迪恩。迪恩睡在车旁的睡袋里，沃伦在车后座上睡着了。迪恩首先中枪，这声音惊醒了沃伦，他透过窗户看到步枪正在瞄准他。他把腿抬起来，中了10枪，有一颗子弹穿过肩膀，其余子弹射中了他的腿。然后枪手就离开了，沃伦听到远处的另一声枪响。沃伦想到迪恩，从车里爬了出来，却站不起来。随后，他看到人们拿着火把朝他这辆车走来，便以为是枪手和他的同伙回来要杀他。沃伦爬到车底下，生怕自己被拖出来。随后，昏倒在地，经临床诊断死亡。人们把他从车底下拉出来，随后两个男孩被紧急送往普洛塞尔皮娜医院。沃伦第二次被抢救过来，但迪安没有反应，医生宣布他已死亡。沃伦随后被紧急送往麦凯医院。

内维尔接着问警探沃伦的车能不能开，这样他就可以把它开回家。警探说这辆车子弹被击中了，车上有72个弹孔，但他会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可以驾驶。第二天，沃伦处于半昏迷状态，我们在医院度过。隔天，我们开车回卡利欧佩的家；内维尔和丹尼尔开着沃伦的满是弹孔的车，我开车跟在他们后面。当我们停下来加油时，一遍又一遍看油箱上的弹孔。

我们到家后发现凯西不见了，但她留了一张纸条。我给她打了电话，然后去接她。她告诉我她很害怕，水泵坏了，她无法给牲口喂水，更糟糕的是，报纸上接连不断登载消息，甚至一些人暗示沃伦和迪安是同性恋，因为他们一起旅行。她说她再也受不了了，于是打电话给加里。加里修好

了水泵，把她带回家。我拥抱她，向她道歉，因为我没有到会发生和报纸有关的事。那天晚上，我收拾行李准备回麦凯，内威尔问我要住在哪里，但我不知道。大约 10 分钟后，我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他几年前离开了卡利欧珀，现在住在麦凯；她说如果我需要的话，还可以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感谢上帝，内威尔不必担心了。

所以我在一位复临信徒家住了一个月，一直住到他们离开……后来，我又找住的地方却没有找到，现在距离我的朋友们离开只有 3 天了。主啊，我该怎么办？

和彼得森妈妈住在一起

那时正是 12 月中旬。那天，在麦凯中心的复临教堂，当我正找车准备离开时，我听到身后有一个声音大喊，“是你呀！”我转过身来，发现原来是一为白发老者带着 2 个女人匆匆向我走过来。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其中一个女人是他妻子，另一个则是他妹妹。他问我是否还在找房子。我回答说是的，但今天是安息日，所以我今天不看房。那人继续说：“我有一位老母亲独自生活，她共有七个孩子，我和妹妹是其中的 2 个。每天晚上，我们七个人轮流和她住在一起，以保安全。自从爸爸去世后，已经好几年了。我们也需要休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全家人一起去度假，或者出去吃饭。而且她吃得很少，我们很担心。我们想知道你是否能帮助我们？因此，我们要请你帮忙。”

他补充说，他妈妈周一要去“早间旋律”节目，因为她喜欢桑迪·斯科特，我妹妹有一张多余的票给你，这样你就可以坐在妈妈身边，看看你们是否能相处得融洽。我向他们要了电话号码，又告诉他们我第二天会给他们打电话。星期一，我在清晨旋律节目中遇到了她们，我坐在彼得森妈妈旁边。演出结束后，我告诉他们我接受这个提议，那天下午我就搬过去了。

我去医院看望了沃伦，下午 6 点左右回到彼得森妈妈家，看到晚饭已经做好了。妈妈已经为全家人做了足够多的饭和炖苹果！我们坐下来，做了祷告，因为在我坐的地方只有一个盘子，我就问盘子在哪里。她告诉我没有盘子了。“食物有什么问题吗？”我问，然后补充道：“如果你不吃饭，我也不会吃。”“为什么不吃？”她问，我说“食物可能有毒。”她站起来说：“我不会毒死任何人的……我吃给你看。”

她拿着一个小盘子和勺子回来了。她吃了一勺说：“看，我还活着。现在吃吧。”我告诉她，她这一口都还没咽下去，我打算再等 10 分钟。所以她又吃了一口，证明没下毒。最后她吃了大约半杯，所以我很高兴。我们洗漱完毕，上床睡觉，感谢上帝的赐福。

像往常一样，布卢护士早上 7 点来了，我听到她对妈彼得森妈妈说：“今天早上你看起来很高兴！”“我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她告诉护士。“是什么事情？”护士问。“我得照顾一位可怜的女士，她的儿子住院了，我真为患病孩子的妈妈感到难过。”我躺在床上微笑；我已经爱上这个老妇人了。第二天，我从医院回到家，彼得森妈妈坐在阳台上，她说：“你迟到了 5 分钟。”隔天，我回到家，发现她已为我打开大门，我可以直接开车进去！

她一天比一天吃得多，我们也轮流做饭。她问我是否是基督徒，“是的，我是。”我说。“我也是，”她说。从那以后，我们的相处得很好，就像母女一样。她告诉我，与早年相比，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她觉得女人去教堂不戴帽子是非常叫人厌恶的一件事。

直到四月初沃伦转到格莱斯顿医院，我一直和彼得森妈妈住在一起。因为那时沃伦做了很多块皮肤移植，于是金色葡萄球菌蔓延在身上开来，他脚跟部位有一个大块皮肤变黑，压迫时有疼痛感。在一个悲伤的 4 月早上 5 点半，在圣麦凯乐园就是彼得森妈妈家，他们一家人不愿让我走，特别是现在彼得森妈妈正在吃饭，而且她已经改变了不少。（她 90 多岁了）这也是我所想的。但我必须离开，因为我也有家人，我们相互代祷，然后我离开了。

我下午两点左右到达格莱斯顿，发现沃伦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去看望他时必须穿着从头到脚的防护服，他的餐盘都是一次性用品，这太可怕了。这种事情在麦凯医院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使得沃伦很担心。他变得非常沮丧。六周后，他出院了，但必须每天来医院包扎腿。

沃伦的小腿有一英尺多没有神经，因为子弹从一条腿上射了出来。有一天洗澡时，他烫伤了脚，直到受伤以后才觉得疼。还有一次，他撞伤了病脚后跟，一块碎骨头划破了动脉，不得不再次住院。他又在医院里呆了几个星期。直到最后沃伦说：“我在这家医院不见好转，我想去布里斯班。”我的心往下一沉，这意味着我们待在家的时间更少了。但他态度坚决，所

以我去见了护士长，告诉她我们想预约去布里斯班皇家医院，想明天早上签字离开。我们回去，有人介绍我们住在露西·谢弗家，因为有人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于是，我们收拾好行李，第二天早上去接沃伦。

我们用蒸汽熏开了医院的信封，却发现信封仅是封了口，里面什么也没有写。但我们还是挂了布里斯班皇家医院第二天早上9点的号。晚上我们到了露西家，听说露西在斐济，她的侄女正在帮她照看房子。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好，上午9点我们去赴约，沃伦在电梯里感觉不舒服。沃伦说他要单独见医生，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最后一个护士出来告诉我医生要见我。

手术

我走进去，但沃伦不见了。医生告诉我，沃伦正在准备做手术，他正在等可用的手术室。“你的儿子病得很重，克鲁维斯太太。他得了败血症，如果我们不动手术，明天就会死。你需要在这张表上签字，我们才能进行手术。你签字吗？”然后他拿出另一张表格让我签字。如有必要，他要截肢。一开始我僵在那里大哭起来，但医生说如果你不签字他就会死，所以我签了字，医生说我们会尽力保住他的腿。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祈祷哭泣。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但是仍然没有病床。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来了，说传染病科有一张床，但医生说：“不让他去那里，这孩子已经受够了，继续找。”又过了半小时，一位护士在老年病房找到一张床。“可以了。”医生说。他来对我说：“我们保住了他的腿，但我们必须从他的脚踝穿进去，所以他需要在医院再住一段时间。”我跟着手推车来到老年病房，一直呆到天黑。

我晚上8点左右到达露西家，却发现大门紧闭着。透过窗户，我看到了屋里大约10个年轻人，我认出来其中有一个叫毛里·赞尼亚。我敲了敲门，露西的外甥女和她丈夫来到阳台上，告诉我必须离开。

我困惑地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那天早上他们带着两岁的孩子去医生办公室打预防针，还问医生关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问题。医生告诉他们，如果小约翰尼割伤自己，金黄色葡萄球菌就会进入他的伤口，杀了他。因

为我和儿子住在他们家的一个房间里，所以医生建议他要求我们离开。我们走后，医生要求他们扔掉地毯，把床单和窗帘送到一个可以给这种菌类消毒的地方，擦洗墙壁和地板、烧掉床垫等等。

我正想告诉他们这一天我是如何过的，但看着他们，心想：“他们像我一样担心他们的小男孩。”我告诉他们我半小时后就走。“可是你要到哪里去呢？”年轻的母亲问道。“我不知道，”我回答。然后她说：“你为什么不下过夜，明天一早离开呢？”我谢过她，走进卧室，跪在地上祷告上帝，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主啊，我往哪里去呢？我在布里斯班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在睡觉前流了很多眼泪。第二天一早7点我就走了。我去了医院的停车场，早餐吃了些水果。早上9点我去看沃伦，他被带去做了x光检查，但他看起来的确比前一天好些了。

在等沃伦回来的时候，我翻了翻包，找到了一些未拆的邮件。在这些邮件中，有一篇论文叫做《阿尔玛火炬》，是由毛里和露西·哈内尔出版的。我开始阅读，然后突然想到，也许他们知道我在布里斯班有什么可以住的地方。露西接了电话，我做了自我介绍，告诉她我打电话的原因。她说4个小时后请打回来，在此时间内她会给周围的人打电话。

下午2点，我回了电话，她告诉我找不到可以收留我的人。她说她和丈夫谈过了，他们有一个房间，里面堆满了一箱箱的书，直到天花板，甚至连窗户都看不到。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床和箱子之间有一个大约6英寸的空隙。“可能会有点挤，”她说，“但欢迎你住在这儿。”我说：“听起来不错。”那天晚些时候我就去了那里。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们格莱斯顿。他们俩面面相觑，笑了，然后告诉我，很多很多年前，毛里曾是州立高中的校长。

哈奈尔一家住在塔姆沃斯·圣安纳利的一个陡峭的街区，陡峭的台阶直通前门，在半路上有一家书店。我曾帮忙他们发订单，就是把书从店里拿出来送到楼上去打包。在安息日，他们会接待客人，其中有两位，分别是乌拉和罗恩·凯布尔。凯布尔出版了一份名为《锚》的报纸。他的脑子太出色了，记忆力极好。我喜欢待在哈奈尔家，深深地爱着他们。毛里告诉我，当他的新学校从格莱斯顿搬到布里斯班时，他把一个小男孩留在自己身边，他的名字叫彼得·比蒂。后来他们成了忘年交，在后来的岁月里，彼得经常像儿子一样去看望他们。

几年后毛里去世时，彼得为他写了一篇感人的讣告。

沃伦在医院住了 10 周。在此期间，他有自杀倾向。有一次，我在给他整理干净衣服时，在他的抽屉后面发现了 18 片安眠药。我问过他，他说会在需要的时候用。[那天晚上我离开的时候提醒了护士，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件事]一天，他对我说：“妈妈，我觉得自己活的不像个人。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困在什么东西里面出不来。别人告诉我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吃饭，一天该做些什么。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发言权，也不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第二天，他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你每天为我们祈祷？上帝不会听你的，否则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你还费什么劲呢？”

第二天，沃伦像往常一样坐在轮椅上，我们走在大楼外的小路上，他突然问我要不要给他买一包烟。我退缩了，看着他。他看着我说：“你打算像其他人一样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吗？”想起他在过去一周提到的感受，我很同情他。我看着他，心想，如果他不能依靠自己的母亲，他还能依靠谁呢？于是我心软了，去给他买了一包烟，祈求上帝饶恕我。我故意不买火柴，希望推迟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把烟拿回去给他，他打开了这时，一个正在抽烟的人走了过来，于是沃伦向他要火柴。那个人照办了，告诉他可以留下那盒火柴，因为他车里还有一盒。沃伦坐在那里，闭着眼睛，脸上带着微笑，抽着烟。他几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第二天，沃伦带着灿烂的笑容来见我。我们和他一起在楼下时，他坐在轮椅上，对我说：“妈妈，我再也不会让你为我做那样的事了。我知道我昨天让你难过了，我很抱歉。”我只是拥抱了他，告诉他我爱他，然后像往常一样泪流满面。那天，医生说下周四，也就是 6 天之后，他就可以回家。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会回来接受后续治疗。我们都非常开心，在 6 天后回到了兴奋的家人身边。

康复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又进行了 6 次治疗。在最后一次治疗时，我告诉医生沃伦上下楼梯是多尴尬。他上楼时四肢着地，下楼时却总是仰面朝天，一步一步地走，尤其公共场合，十分尴尬。“他没有穿矫形鞋吗？”医生问。我说没有。他就给医院的另一位医生打电话，让我们去找他。“你出院的时候没有预约吗？”骨科医生问。我摇了摇头。

他问我我们当天什么时候回家，我回答说：“希望是在下午 2 点左右。”他打电话给骨科鞋匠，把这件事告诉他，让他把我们送到附近。我们去了坎普·希尔鞋匠的办公室，他直接带我们进去了。鞋匠给沃伦量好尺寸，给他的脚打了个简单的石膏。回家的路上，沃伦一直在说：“我不会穿那双可怕的大靴子。”

我们又三次造访鞋匠。第二次拜访结束时，这个人问沃伦：“你想要什么样的鞋？”沃伦只是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那个人把他带到隔壁房间。有靴子，工作靴，正装鞋，凉鞋，还有运动鞋。沃伦笑着说：“我能穿运动鞋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那人回答。最后一次见他是为试穿，试穿时，沃伦甚至不愿意试一下，看看穿在脚上是什么感觉。我们买了鞋，半下午时回到家。

沃伦让我先进屋去，于是打开我车里的东西，进了屋。我偷偷从卧室的窗户往外看。他穿上鞋，然后下了车，站起来，绕着车走。他面带微笑，朝围场跑去，因为棚屋遮挡，我看不见他了。我偷偷溜出去，以为他就山脚下，但是没有。沃伦爬上了俯瞰整条河的山脊。他走了差不多 400 米远！然后又走回来。我冲出去，佯装在做什么，希望他不会心脏病发作，因为他已经 10 年没有正常走路了。他在前廊的台阶上上下下了几下，然后回来说：“妈妈，我可以上下台阶了。”我突然哭了起来，走到他面前，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为他的尴尬感到难过。他笑着说：“我以为你会很高兴，你不该哭。”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

几周后，当地警察打电话询问沃伦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他很沮丧，因为他失去了很多独立的机会，而且住院时他的驾照到期了，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再换一张。“我去看看他，”D 警察说，“他在哪儿？”“在棚子里。”

我说，然后他就消失在棚子里了。一会儿，警察回来和我道别，说他已经告诉沃伦该怎么做了。沃伦走进来告诉我，警察告诉他要温习交通规则，并练习驾驶技术。他专心地和一个朋友一起学习、练习。三周后，D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考试的地址和时间。沃伦紧张得要命……但是还是和朋友去了。一名警察问了他一些问题，包括姓名的拼写、出生日期等。沃伦以为接下来就是驾驶考试，但警察走了出来，微笑着递给一个驾照，让他去格莱斯顿的驾照登记处拍照。沃伦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握了握手，然后去格莱斯顿拍了张照片，敲定了驾照。

从那一刻起，沃伦再没有停滞不前。他在离家不远的养鹿场找到了一份工作，还配有制服。这给了他巨大的鼓舞。然后他参加了残疾部门的课程，成为了一名装配工、车工。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32岁时，他第一次离家，一路开车去了达尔文，在凯瑟琳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监督铁路专用混凝土轨枕的机械，因为“甘”字号铁路某些轨枕带电。工程结束后，他又留下来监督拆除整个工厂。此后，他又去了兰杰矿山，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2021年矿山关闭。我们为他感到骄傲，后来当凯西被诊断出患有遗传性黄斑营养不良，几乎失明时，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说他经历了很多，他不想让她失明。他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如果她需要钱，就告诉他。

在这之后，我加入了“罪案受害者”组织，做了两年半的志愿者，辅助法庭做受害者的工作，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很多受害者从来没有去过警察局，更不要说法庭了，只知道他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情节。他们害怕面对罪犯，担心出庭律师以及律师团的提问。所以，在他们的案子开庭前一周，我和法院书记员会带他们到法庭，解释所有的程序——就坐的位置，向国旗鞠躬，法官的房间，以及如何保护儿童证人不看到他们的行凶者等等。我还告诉他们，我会陪他们办案，如果他们心理不高兴，我会带他们去茶室，开车送他们来到或离开法庭等等。在开庭当天，受害者们变得更加放松自信，这证明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许多人还特意感谢我，说我缓解了他们的焦虑，我每个月平均接到一到两个案子。

大约就在此时，有一天晚上，我发现大儿子史蒂文坐在大棚屋外的一把椅子上看星星。我告诉他晚饭准备好了，但他没有反应。我走近他，他说：“我刚用完最后一点毒品，不会再用了。”他接着说：“如果没有你，

我不知道我现在会在哪里。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但你一直守在我身边。我为所犯下的案件以及我给你带来的伤痛后悔。从现在起，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他信守诺言，戒掉了毒品，我为他感到骄傲，感谢上帝回应了另一个祈祷。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他吸毒是为了逃避我们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我拥抱了他，再次感谢上帝。现在史蒂文仍然住在离我们家 200 米远的一所房子里。他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至少与我们联系两次。每周至少为我们做一次饭，并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卡车、割草机、拖拉机或是栅栏需要修理时。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都受了影响。孩子们出车祸的时候凯西大概 8 岁，18 岁的时候她就当妈妈了。因此我们错过了母女相处的时光，我为此感到惋惜。但她嫁给了一个爱她照顾她的好男人，尤其是现在她失明了，他需要在家工作。我们爱罗杰，但他生活很艰难。

发现

沃伦有了鞋，开始适应日常生活，我们的生活也逐步回归正常。我和朋友简，她住在耶蓬，决定去巴伦丹住一个星期，帮凯里·罗兰森出版新教报纸。那是在 1994 年，那时，凯里说提到他不再相信三位一体信条了。

“为什么呢？”我问。“夏娃从哪里来？”“由亚当的肋骨所造。”简说。“你说是在他的胸部的的位置吗？”“我想是的，”我说。“基督从哪里来？”我们都回答说：“从天父的怀抱里！”“这么说，父在基督之前就在那里了？”我们只是互相看了一眼，就在这时，有人打断了我们谈话，于是我们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当我们离开罗兰森一家回家时，简说：“你对凯里昨晚所说的话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吗？”我反问她说：“你认为这是一个救赎的问题吗？”她回答说：“我不知道。”在回家的路上，她花了 11 个小时查考《圣经》，找到和圣父圣子相关的经文。

我们决定在家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研究。因为我们当时认为爱伦·怀特也相信三位一体这一说法，所以决定只查考圣经。我们紧张地学习了 4 个月，完全自觉有罪。我们误解了上帝的品性，就是我们现在所敬拜的圣经

中的上帝！我不寒而栗，教皇说出许多谎言，成功蛊惑人民。我感谢上帝，祂带我出离了那个残酷、欺骗的教会，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如何用恐惧辖制人的。

简打耶蓬来和我一起过安息日。当来自罗克汉普顿的维拉和艾米打电话告诉她们要突然造访时，她已经离开家了。简到了以后，我告诉她维拉和艾米也会和我们一起过安息日，所以我们决定不向他们提及三位一体的话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缜密的推敲。我们唱了几首赞美诗，读了《评论与先驱报》上的一篇文章。然后我们讨论了这一周遇到的见证。维拉谈起了她正在读的东西，当她提到“三位一体”这个词时，内心中有股力量促使我跳了起来，说：“根本就没有三位一体这种说法！”

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事情，琼好像要钻进地缝，然后消失不见。维拉看着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重复说没有三位一体教义。艾米跳起来说：“这房子被咒诅了；你是恶魔瓦尔，我想回家。”我告诉维拉，我和简正在学习三位一体的教义以及为什么我们会学习这些。维拉安静下来了。就在这时，内威尔走了进来，询问离午饭时间还有多久。我告诉他我们马上就准备好了，告诉他需要等半个小时。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大约在 1995 年，我完成了关于上帝三位一体教义的研究。维拉打电话告诉我，她、简还有我，我们三个人都在研究这一主题，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把研究结果发给几个人。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份匿名的标准格式的影印引文。原来爱伦姐妹也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我欣喜若狂。我打电话给简，她也很兴奋。我继续把研究报告寄给熟识的人，甚至还寄给了美国的鲍勃牧师和佩吉·博伊德弟兄，他们后来也出版了自己的书。虽然在这个问题我不是第一个联系他们的人；一个朋友一直试图向他们说明这项真理，而我的研究为他们的朋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们来到家里，告诉我错得有多离谱。一个女人恳求我，而她的丈夫跪着，流着眼泪祈祷。但我的态度却很简定，因为随着日子的过去，我对这一真理的认识日渐清晰。他们走了，我们的友谊就此中断。接下来就是教会里有人反对；甚至还因为这个问题离开了教会。我为是上帝的带领而高兴，因为现在有许多声音为他说话。

三儿子丹尼尔

我们最小的儿子丹尼尔现住在伦敦。我希望他成为一名布道士，但是他不愿意。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和三岁的凯西经常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凯西抱着洋娃娃，丹尼尔拿着泰迪熊。我以为他们坐在那里为了晒太阳，但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丹尼尔说：“他今天也不来了，凯丝。”考虑到陌生人的危险，我问道：“今天谁不来了？丹尼尔说：“耶稣。”“你说过他会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复临。”

还有一次，丹尼尔不愿起床参加早间敬拜。我进去想看看为什么，但他用床单把头盖上了。我把床单拉下来，看到的是一张泪流满面的脸。“怎么了？你生病了吗？”他摇了摇头。“那怎么了？”我问。“我不想伤害耶稣。”他又流下了很多眼泪。我拥抱他，告诉他耶稣知道他还在成长，还有很多要学，耶稣会一直引导他做正确的事。

还有一次，他不愿意唱我为早间敬拜所选的歌曲，《降伏于你》。他说他不愿唱这首歌，因为他还没有把一切都交给耶稣！他 13 岁时就在班达伯格的伯内特河接受了由格雷厄姆·伯格曼主持的洗礼。我也受洗加入了上帝的普世教会。在埃默拉尔德工作多年后，丹尼尔在 21 岁生日后的一周去了伦敦，我们非常想念他。

他 28 岁回来，和我们住了一个星期，带着女朋友。那时，我想告诉他三位一体教义是错误的，但他说他不想接触我所崇拜的上帝了。“妈妈，你告诉我上帝是爱，但当你了解到海外的艰难以及其他事情时，我认识到我最好还是做一个佛教徒，崇拜一个更温和的神……”我很震惊。后来，他娶了一位泰国律师。他们在一起过了七年，除了她和前夫生的一个孩子外，他们没有要孩子。2012 年丹尼尔死于自杀。葬礼结束后，我们从他的朋友那里得知，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他是受害者。我们对他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并将其送来澳大利亚安葬，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上帝彰显他的旨意

在丹尼尔葬礼之前，在我向上帝祈祷时，突然冲动地埋怨说：“这不公平。你的儿子复活了，玛丽亚的儿子三天后也复活了。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但是我一想到基督现在与天父同在，至今还是带钉痕的血肉之躯时，就后悔了。我想，如果沃伦把自己献给上帝，他就会有一个完美的身体，不再有伤疤。我请求祂饶恕。接着又有一个声音说：“我把那个孩子(但以理)交给你养育。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

“我知道我的工作做完了，”但我又问，“主把孩子们交给我们代为管理吗？”他们不也是我们的孩子吗？”可是我未得到答复。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像哈拿把小撒母耳交给上帝，我把丹尼尔交给了耶和华。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有幸和这么可爱的儿子在一起。

葬礼结束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坐在阳台上，想着沃伦和丹尼尔对我说过的话。沃伦说，你还费什么劲为我祷告呢？而丹尼尔想要一个充满爱的神。所以，我想到这一切，做了一个决定，说：“主啊，我一直依靠你，你垂听了我的许多祈祷，在需要的时候也帮助我。你一直在照顾我，我不想离开你。但主啊，我必须请问你。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上帝。因为如果你不是你所描述的那一位，我将不得不离开你，因为我不能崇拜一个矛盾的上帝。请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

我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去查考圣经，因为其中谈到我的品性。”我查考了圣经，看到了诗篇 78:49，这是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这一篇谈到了以色列人红海的逃亡和埃及人随后的遭遇。诗篇 78:49 说：在希伯来人过海之后，“他使猛烈的怒气和忿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他让邪恶的天使进入他们(埃及人)之中”……我也读了约伯的第一章，以及他每天如何为他的孩子祈祷献祭。我读到撒旦在天堂得到允许考验约伯，以及他怎样毁灭约伯的孩子，而最后约伯又生了许多孩子，等等。我不想要更多的孩子来取代失去的，就好像他们毫无价值一样。我只想留住上帝原本给我美丽的孩子们。

我也查考爱伦姐妹所说的话，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答案。上帝就是他所说的上帝。上帝就是爱，不是别的。现在对我来说，约翰福音 3:16 的意义比以前更丰富了。

林前 13:4-8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所有这一切，连同十诫，完美地向我们描述了上帝的品格。

人们曲解上帝之爱。上帝的爱是传给这个黑暗世界的最后信息。上帝的震怒就是在他无法帮助罪人的时候，向罪人掩面。甚至基督在十字架时也经历了天父的愤怒，当父把自己藏在云彩中时，基督喊道：“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都是毁灭者造成的伤害，又利用罪人来帮助他。

我因这些发现欣喜若狂，流下了许多泪水。我太高兴了，想都没想就说：“主啊，我非得失去儿子才能发现这些美妙的真理吗？但我得到的回答是：“我把我的圣子给你，就是这个原因。”我又哭了起来，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卑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他任何问题。

所以 2012 年年底，我写了一篇小论文，传给不信主的人们，让他们知道上帝的爱，是撒旦做了所有肮脏的事情，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不要灰心丧气。我把文章寄给了 10 个人。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是我姐姐，她问我关于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第二个是海伦·D，她说她丈夫死的时候她们正在研究这个课题。然而有一些人反对这论文，其中有个人是补偿部的 P 兄弟，他说他们要来做一次教牧访问。其他人没有回应。我对教牧访问感到非常失望，因他无非要证明我们错了。（海伦·D 过来支持我）他们都走了，我学习得更多了。

一天，海伦·D 打电话说：“我找到了一个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他要举办宴会，他马上要去露营。我很感兴趣，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是历史了。我们参加了在阿德里安举办的第一个逾越节夏令营，我义无反顾。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这些知识带给我们最大好处是，当我们知道所谈论的是谁，就能越发自信地与他人交谈。

我等不及到天堂…与我的救主相会…他永远带领我们与他相近。

赞美上帝美妙的爱与引导！

瓦莱丽·克鲁伊斯

上帝要顾念你

当我们身处艰难困苦当中，上帝在哪里？在瓦尔·克鲁斯的见证中，她向我们证明上帝一直和她同在。从最初她失明的父亲将她抚养成人，再到她的孩子们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难，最后是她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斗争，基督带着她度过了所有难关，并加给她忍耐的力量。

即使身处艰难之中，瓦尔也决心更多地认识上帝。因为她成长在天主教家庭，所以对《圣经》知识知道的不多。但她一听见神父的教导，就去遵行——无论是学习十诫，戒烟，还是考察《圣经》在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合理性。不论她的年纪多大，瓦尔仍然有受教之心，正是这种受教之心使她认识了圣父与圣子的关系。这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上帝赐给她信心，让她在巨大的悲剧中看到她需要认识上帝的品格，他引导她发现最宝贵的真理。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 4:18 分)

愿瓦尔的见证帮助我们铭记天父对我们不断的关怀，祂是永远值得我们信赖与忠诚的。